



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分析 ——益贫性视角

姓 名： 刘庆文

专 业： 政治经济学

学 号： 2022000380

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分析——益贫性视角

刘庆文 2022000380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共享发展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经济增长益贫性则是共享发展理念在经济层面的具体体现。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借鉴国内外关于益贫式增长的研究成果，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从共享发展层面对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了简单测度。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 2001-2012 年间整体表现出了一定的益富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大。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发展的主要目标变为高质量增长，并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从共享发展层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共享发展 益贫性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GDP 总量实现了快速上升，由 1978 年的 3678.7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08782.5 亿元，增长约 274 倍，平均 GDP 增长率约为 9.44%，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 2.93%，中国 GDP 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也从 1978 年的 1.73% 上升至 2020 年的 17.26%^①。但正如课件中所说，GDP 指标存在不能反映社会福利的变化情况、不能体现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和环境成本、不能反映其物质产品的构成和质量等问题，因此无法用于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于西方学界使用索洛余量、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等指标来片面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我国主流观点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②，因此共享发展就成为衡量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共享发展的概念首次提出于十七大报告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发展的关键就是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的对象包括经济民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② 人民日报社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2017 年 12 月 20 日。

生、民主权利、精神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等，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益贫式增长可以简单概括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基本思想是让经济增长更多惠及低收入人群，是在分配层面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可以作为共享发展理念在经济层面的具体体现（范从来、谢超峰，2018）。所以，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而从经济共享发展层面简单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益贫式增长的含义

益贫式增长在 1999 年被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有利于贫困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其具体含义却存在很大的争论。Chenery（1974）建立的增长再分配模型被认为是益贫式增长争论的起源，随后，许多机构和组织都曾提出过益贫式增长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准确的定义。Kakwani 和 Pernia(2000)认为益贫式增长可以定义为使穷人能够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显著获益的增长。联合国（2000）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2001）则将益贫式增长广义地定义为有利于穷人的增长，但并未说明穷人应该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多少收益才能称为益贫。

为了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学者们对益贫式增长的定义逐渐清晰并具有可操作性，但意见仍不统一。White 和 Anderson(2001)比较了三种关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

（1）穷人的收入份额超过其现有份额；（2）穷人的收入份额超过其人口份额；（3）穷人的收入份额超过某些国际标准。并认为第一种定义缩小了穷人与富人的相对差距，第二种定义缩小了穷人与富人的绝对差距。而 Ravallion 和 Chen (2003) 指出在收入分配不变的条件下，贫困发生率减少，经济增长就是益贫的。Kakwani 和 Son(2003)在分析了多种关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后，将益贫式增长分为绝对益贫式增长和相对益贫式增长：绝对益贫式增长是指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贫困人口获取的收益的绝对量高于或等于非贫困人口，也被称为“超级益贫”，相对益贫式增长是指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非穷人，或者穷人的收入增长率超过平均收入增长率。OECD（2004）则不关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平等变化情况，认为只要穷人的收入增长率大于 0，经济增长就是益贫的。Kakwani 和 Son(2007)对该定义进行了批判，认为益贫式增长不仅仅要求贫困的减少，还要求增长的利益更多地流向穷人。随后，Kakwani 和 Son 等人（2010）又提出，如果收入分配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增益，相应的经济增长就是益贫式增长，否则就是利富的。

从以上学者们对于益贫式增长的争论来看，益贫式增长的含义大致可分为三种：第

一种是强绝对益贫即“超级益贫”，强调穷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受益的绝对量高于非穷人，这种情况在现实中难以发生；第二种是弱绝对益贫，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考虑穷人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只要绝对贫困下降，增长就是益贫的；第三种是相对益贫，要求在穷人绝对贫困下降的同时，收入不平等情况也要得到改善。对此，Lopez（2006）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重视经济增长，就选择弱绝对益贫式增长的定义，使更多的非穷人也收益；如果一个国家重视公平，就选择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定义，改善社会中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状况。由于我国已经在整体上消除绝对贫困，且主要矛盾也已发生改变，因此上文中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益贫性的测量就是基于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含义进行的。

三、益贫式增长的测度方法

对经济增长益贫性的测度有多种不同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本文简单总结了以下三种方法。

1. 益贫增长指数（PPGI）

该方法由 Kakwani 和 Pernia(2000)提出，用于测量经济增长有利于穷人的程度。其将贫困的变化 P_{12} 分解为增长效应 G_{12} 与不平等效应 I_{12} 之和，前者代表收入再分配不变时，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

$$G_{12} = \frac{1}{2} \left[\ln[\theta(z, \mu_2, L_1(p))] - \ln[\theta(z, \mu_1, L_1(p))] + \ln[\theta(z, \mu_2, L_2(p))] - \ln[\theta(z, \mu_1, L_2(p))] \right]$$

后者代表经济增长不变时，收入再分配对贫困的影响：

$$I_{12} = \frac{1}{2} \left[\ln[\theta(z, \mu_1, L_2(p))] - \ln[\theta(z, \mu_1, L_1(p))] + \ln[\theta(z, \mu_2, L_2(p))] - \ln[\theta(z, \mu_2, L_1(p))] \right]$$

其中， θ 是与贫困线收入 z 、平均收入 μ 和洛伦兹曲线 $L(p)$ 有关的贫困衡量标准。而益贫增长指数可以表示为总效应 P_{12} 与增长效应 G_{12} 的比值：

$$PPGI = \frac{P_{12}/g}{G_{12}/g} = P_{12}/G_{12}$$

其中， g 为人均收入增长率， $PPGI$ 越大表示经济增长越具有益贫性。当 $PPGI > 1$ 时，经济增长是严格益贫的；当 $0 < PPGI < 1$ 时，经济增长依然能够减少贫困，但不平等也随之增加；当 $PPGI < 0$ 时，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的增加，不具有益贫性。

2. 益贫增长率 (PPGR)

该方法由 Ravallion 和 Chen (2003) 提出, 通过直接观察穷人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来测量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设收入的累积分布函数为 $F(x)$, 收入不超过 x 的人口比例为 p , $L(p)$ 为洛伦兹曲线。则有:

$$L(p) = \frac{\int_0^x t dF(t)}{\int_0^{+\infty} t dF(t)} = \frac{1}{\mu} \int_0^p x(q) dq = \frac{x(p) \cdot p}{\mu}$$

其中, μ 代表社会平均收入, $x(p)$ 代表收入由高到低占比为 p 的人口的收入。文中将益贫增长率 $PPGR$ 定义为穷人收入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PPGR = \int_0^1 \Delta \ln(\mu_p) dp = \Delta \ln(\mu) + \int_0^1 \Delta \ln(L(p)) dp$$

其中, $\Delta \ln(\mu)$ 代表了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率, $\int_0^1 \Delta \ln(L(p)) dp$ 代表洛伦兹曲线即不平等的变化, 当不平等下降时, 洛伦兹曲线向上移动, $PPGR$ 有正收益, 表示经济增长是有益于穷人的, 反之就是不益贫的。张德亮等 (2013) 在该理论的基础上, 将益贫增长率 $PPGR$ 表示为贫困人口平均收入增长率, 当贫困人口平均收入增长率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率时, 经济增长就是益贫的, 反之就是不益贫的。

3. 贫困等值增长率 (PEGR)

该方法由 Kakwani 和 Son (2008) 使用, 与第一种方法的分析思路类似, 关注增长、贫困和不平等三者之间的关系, 可简单表示为: $PEGR = PPGI * g$, 其中, g 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具体来看, 该指标也借鉴了第二种方法的分析方法, 贫困的变化总量 $\Delta \theta$ 由各分位点上贫困的变化量 ΔP 加总而来:

$$\Delta \theta = \int_0^H \frac{\Delta P}{\Delta x} \Delta x dp = \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g(p) dp$$

其中, $g(p)$ 代表 $x(p)$ 的增长率或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率, 由②式可知:

$$g(p) = \Delta \ln \mu L'(p) = \Delta \ln \mu + \Delta \ln L'(p)$$

P 代表任意的贫困衡量函数, 一般与贫困线、个人收入、洛伦兹曲线等因素有关, 如: FGT 贫困测量指数中, P 就表示为:

$$P_\alpha = \frac{1}{n} \sum_{i=1}^q \left(\frac{z - x_i}{z} \right)^\alpha$$

此时, 贫困总量的变化率 $\Delta \ln \theta$ 可表示为:

$$\Delta \ln \theta = g \left[\frac{1}{\theta} \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dp + \frac{1}{g\theta} \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g(p) dp \right]$$

其中, $\frac{1}{\theta} \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dp$ 代表①式中的增长效应 G_{12} , $\frac{1}{g\theta} \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g(p) dp$ 代表①式中的不平等效应 I_{12} 。则贫困等值增长率可表示为:

$$PEGR = PPGI * g = \frac{\Delta \ln \theta / g}{G_{12}} = \frac{\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g(p) dp}{\int_0^H \frac{\partial P}{\partial x} x(p) dp}$$

与益贫增长指数 (PPGI) 相比, 贫困等值增长率 (PEGR) 考虑了真实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并且更加具有一般性。当 $PEGR$ 大于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 g 时, 就表示 $PPGI > 1$, 贫困和不平等同时减少, 即严格益贫, 当 $0 < PEGR < g$ 时, 表示贫困减少但不平等增加; $PEGR < 0$ 时表示经济增长不具有益贫性。

四、我国经济增长益贫性的测度

1. 测度方法

本文基于益贫增长率 (PPGR) 的测算理论, 同时借鉴了张德亮等 (2013) 的测量方法, 对我国近 20 年经济增长的益贫性进行了测算:

$$\Delta \ln[L(p)] = \Delta \ln \mu_p - \Delta \ln \mu$$

其中, $\Delta \ln \mu_p$ 可反映占比为 p 的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变化, 因此定义 $g_p \equiv \Delta \ln \mu_p$ 为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增长率; $\Delta \ln \mu$ 可反映社会的人均收入变化, 因此定义 $g \equiv \Delta \ln \mu$ 为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最后, 定义 γ 为益贫判定系数:

$$\gamma \equiv g_p - g = \Delta \ln[L(p)]$$

若 $\gamma > 0$, 说明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高于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 $\Delta \ln[L(p)] > 0$, 即洛伦兹曲线向上移动, 收入不平等下降, 此时的扶贫政策是益贫的, 反之则是不益贫的。

参照我国的贫困分类, 本文将贫困人口定义为收入五等分数据中的低收入户 (20%) 和中等偏下收入户 (20%), 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收入五等分数据计算我国的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率 g_p 和社会人均收入增长率 g , 进而计算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益贫判定系数 γ , 具体步骤为:

第一步, 计算 g 。设 N 表示收入组, T 表示增长区间, I_n^t 表示对数化后的第 n 个收入组在第 t 期的人均收入, 则:

$$g = \frac{1}{N} \sum_{n=1}^N (I_n^t - I_n^{t-T})^{\frac{1}{T}}$$

第二步, 计算 g_p 。设 P 为贫困人口所在的收入组, 则:

$$g_p = \frac{1}{P} \sum_{n=1}^P (I_n^t - I_n^{t-T})^{\frac{1}{T}}$$

第三步, 计算我国经济增长的益贫判定系数: $\gamma = g_p - g$ 。

2.测度结果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 2001-2019 年的数据进行益贫性的测度。其中, 2001-2012 的益贫性数据是基于中国农村居民五等分人均收入数据、城镇居民五等分收入数据以及中国农村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估算而来, 2013-2019 的益贫性数据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五等分人均收入数据测算而来。结果如下:

表 1 中国 2001-2012 年经济增长益贫性估算^①

增长区间 (T=1)	$\gamma_{\text{农村}}$	$\gamma_{\text{城镇}}$	$\gamma_{\text{中国}}$	是否 益贫
2001-2002	-0.50	-9.35	-6.17	否
2002-2003	-2.14	-1.06	-1.15	否
2003-2004	1.99	-1.17	-0.12	否
2004-2005	-1.83	-1.42	-1.42	否
2005-2006	0.08	0.93	0.81	是
2006-2007	-0.34	0.52	0.43	是
2007-2008	-1.44	-1.65	-1.49	否
2008-2009	-2.15	0.77	0.24	是
2009-2010	1.81	1.25	1.41	是
2010-2011	-3.71	0.51	-0.29	否
2011-2012	0.42	2.30	2.04	是
2012-2013	0.45	0.61	0.66	是
均值	-0.71	-0.76	-0.52	否

表 2 中国 2013-2019 年经济增长益贫性测算

增长区间 (T=1)	相对贫困人口人均 收入增长率%	社会人均 收入增长率%	$\gamma_{\text{中国}}$	是否 益贫
2013-2014	9.78	9.67	0.11	是
2014-2015	9.18	8.63	0.55	是
2015-2016	6.92	7.68	-0.77	否
2016-2017	7.27	7.72	-0.45	否
2017-2018	5.73	5.67	0.06	是
2018-2019	11.51	9.16	2.35	是
均值	8.4	8.09	0.31	是

^① 注: 由于以农村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为权重估计出的全国居民五等分人均收入数据倾向于平均化, 因此会高估相对贫困的改善情况, 使益贫性判定系数偏高。

2001-2019 年整体均值	-0.15	否
-----------------	-------	---

3.结果分析

由上表 1 和表 2 可知，从整体来看，近 20 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一定的“益富”性，导致我国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恶化：

表 3 我国主要相对贫困指标^①

时间	相对贫困发生率			相对贫困程度		相对贫困指数	
	农村	城镇	全国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2002	26.97%	1.26%	17.09%	2.93	2.50	0.7910	0.0314
2005	29.89%	2.60%	18.29%	2.97	2.67	0.8875	0.0695
2008	52.10%	6.64%	30.94%	2.99	2.67	1.5578	0.1775
2010	59.71%	9.42%	34.95%	3.01	2.57	1.7967	0.2423
2011	62.07%	12.55%	37.06%	3.09	2.57	1.9180	0.3228
2012	64.62%	15.13%	39.00%	3.09	2.46	1.9948	0.3724
2013	54.76%	18.59%	35.58%	3.05	2.45	1.6716	0.4549
2014	54.76%	20.27%	36.05%	2.97	2.54	1.6273	0.5140
2015	55.33%	21.21%	36.39%	2.95	2.48	1.6324	0.5253
2016	56.75%	22.61%	37.38%	3.01	2.49	1.7098	0.5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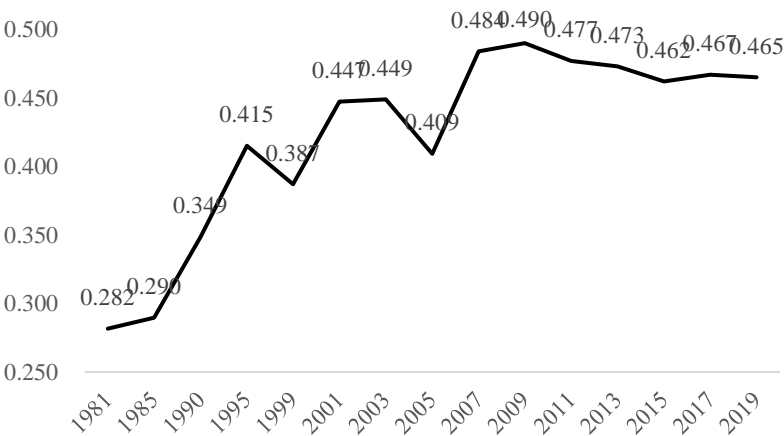


图 1 1981-2019 基尼系数变化^②

^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世界银行 PovcalNet。

^② 数据来源：UNU-WIDER。

如上表 3 所示，我国相对贫困发生率从 2002 年的 17.09%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37.38%，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率从 26.97%增长到 56.75%，城市相对贫困发生率从 1.26%增长到 22.61%。同时农村和城镇的相对贫困程度也在不断上升，因此我国的相对贫困指数（李永友、沈坤，2007）也随着相对贫困发生率和相对贫困程度的上升而上升。其中，农村相对贫困指数从 2002 年的 0.791 上升至 2016 年的 1.710，城镇相对贫困指数从 2002 年的 0.031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63。上图 1 也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0.282 上升至 2019 年的 0.465，表明在共享发展层面上，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并不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正逐渐发生改变，整体从“益富”趋向于“益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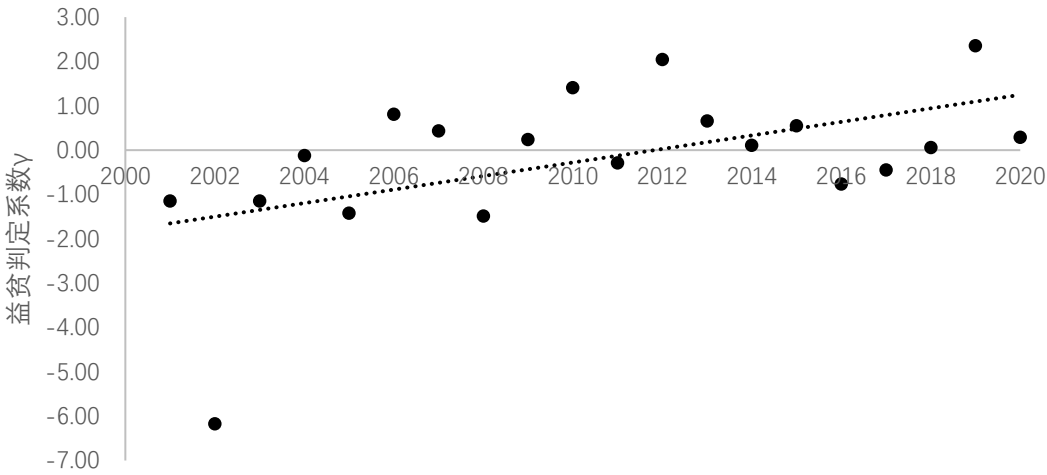


图 2 2000-2020 经济增长利贫性变化

这表明虽然我国的相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状况整体上有所恶化，但大约在 2012 年左右，我国的相对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与遏制，在 2013-2019 年间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在共享层面上有了明显提高。

本文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 2013 年以来，我国加大了扶贫力度，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举国体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在政治方面，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政府主导地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立下“扶贫军令状”，并建立与脱贫相关的绩效考核制度；在社会方面，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实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等政策（韩旭东、郑风田，2021）；同时创造性提出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等多种方式，创新机制，拓宽渠道，加强国际反贫

困领域交流”^①；在人力、资金、监督等方面也建立了相应的扶贫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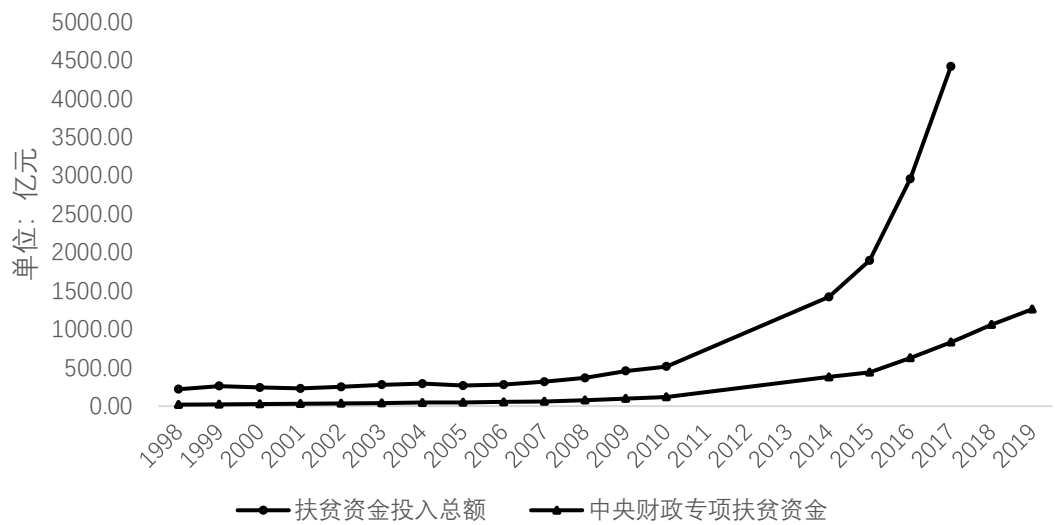


图 3 1998-2019 年中国扶贫资金投入情况^②

如上图 3 所示，2013 年以后，我国扶贫资金投入总额平均增速约为 46.28%，相较于 1998-2010 年的 7.84%有了明显的大幅提升，中国的相对贫困状况有所好转，基尼系数与相对贫困发生率的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也开始扭“负”为“正”，从而在共享发展这一层面上推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从共享发展层面对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了简单测度。结果表明，2001-2012 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以追求发展速度为主要目标，整体表现出一定的益富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基尼系数和相对贫困发生率均随之上升。2013 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追求发展质量为主要目标，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实施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战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从共享发展层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事实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相比仍有较大距离，因此今后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党的领导下，以缓解相对贫困为主要抓手，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的惠及低收入群体，从共享发展层面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①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

^②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2020 年）。

参考文献

- [1]范从来,谢超峰.益贫式经济增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实现[J].中国经济问题,2018(02):3-12.
- [2]韩旭东,郑风田.精准扶贫经验分析与价值总结——基于举国体制制度优势[J].当代经济管理,2021,43(09):1-8.
- [3]李永友,沈坤荣.财政支出结构、相对贫困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11):14-26+171.
- [4]张德亮等.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减贫（第一版）[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02):79-84.
- [5]Chenery H . 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policies to improv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rowth[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74, 90(2):610.
- [6]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Rising to the global challenge: Partnership for reducing world poverty." policy statement by the DAC High Level Meeting upon endorsement of the DAC Guidelines on Poverty Reduction. 2001.
- [7]Howard White, Edward Anderson. Growth versus Distribution: Does the Pattern of Growth Matter?[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001,19(3).
- [8]Kakwani, N. and E.M. Pernia. What is Pro- Poor Growth?[J].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2000,18(1):1-15.
- [9]Lopez, J. H. Pro—Poor Growth: A Review of What We Know [M]. The World Bank (PRMPR), 2006.
- [10]Martin Ravallion, Shaohua Chen.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J]. Economics Letters,2003,78(1).
- [11]Nanak Kakwani,Hyun H. Son,Sarfraz K. Qureshi,G. M. Arif. Pro-poor Growth: Concepts and Measurement with Country Case Studies[J].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2003,42(4).
- [12]Nanak Kakwani, Marcelo Neri and Hyun H. Son. Linkages between Pro- Poor Growth, Social Programmes and Labor Market : The recent Brazilian Experience[J]. World Development, 2010,38(6):881-894.
- [13]OECD, 2001,“Rising to the Global Challenge: Partnership for Reducing World Poverty”,

Statement by the DAC High Level Meeting, April 25~26., Paris: OECD.

[14]OECD, 2004, “Accelerating Pro- Poor Growth through Support for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mimeo, OECD, Paris.

[15]Son H. H, Kakwani N. Global Estimates of Pro-Poor Growth [J] .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 (6): 1048-1066.